

美国全球粮食战略中的拉美和中国

· 赵丽红

内容提要 粮食和石油一样, 是重要的战略资源, 它关系到世界各国的发展和安 全, 只有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 各国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美国权势集团从“取消世界粮食储备制度”“农业商业化”“绿色革命”到“基因革命”和“生物燃料革命”, 不断使用新技术以逐步控制世界粮食生产和贸易。在粮食商品化和粮食政治化的相互作用下, 现在已有不少国家因引进美国的现代农业技术、转基因种子和化学肥料, 导致其农业逐渐形成对美国的严重依赖。2005年以来, 跨国资本已侵蚀中国的粮油市场, 中国粮食安全堪忧。

关键词 粮食战略 美国 拉美 中国

一 美国全球粮食战略

美国的全球粮食战略可追溯到 20 世纪 30 年代末, 它是由少数几个私人基金会资助的。这些基金会是以维护以洛克菲勒家族为代表的美国大家族的财富和权利为宗旨的, 这些大家族被称作“东海岸权势集团”。它们通过项目资助的隐蔽形式在能源、教育、医学、生物学及对外政策等领域扩大其影响力, 从而构建美国权势集团称霸世界的计划, 这一战略计划后被五角大楼称为“全方位优势”(FSD)。粮食和石油一样, 都是美国谋求世界霸权地位的重要战略资源。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 美国就着手重塑粮食政策和世界粮食结构。一方面, 通过美元贬值来提升美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通过政府补贴和商业资本的挤压打击其他国家的粮食生产能力, 不断巩固美国在世界农业市场的优势地位,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供应国。另一方面, 嘉吉、ADM 和邦基等美国跨国农业巨头不断游说, 使美国和欧盟完全取消了沿袭多年的粮食储备制度, 使世界粮食库存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降至历史最低点。在 1973 年的粮食危机中, 美国的 6 家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粮食储备的 95%, 它们操控着世界粮食的供应和价格, 使当时国际市场上粮食价格以 300% ~ 400% 的速度上涨。¹

(一) 基辛格的粮食政治

“粮食政治化”使粮食成为国际政治硬实力的

一个标志。亨利·基辛格²将“运用粮食作为武器”这一理念引入美国的外交政策中。从此, “粮食武器”成为美国影响深远的政策信条。粮食援助成了援助国打击、改变和控制受援国的农业生产体系, 进而形成对援助国的经济依赖和政治依赖的绝佳武器。基辛格将粮食援助视为“国家权力的工具”, 他毫不掩饰地提出, 美国应对粮食援助实行配给限额以“帮助那些未能或者不愿意控制人口增长的国家”。

1974 年, 基辛格起草了《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 200 号》, 标题是《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国家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影响》。这一文件于 1989 年被解密。在《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 200 号》的《粮食换和平与人口》这一部分中写道: “人口增长对全球政治经济生活最基本的影响之一是人口增长与粮食的关系。当这种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出现短缺的时候, 人口、国家资源、环境、生产力和政治经济稳定问题就会交织在一起。”《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 200 号》还写道: “大多数高质量的矿藏位于发展中国家, 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都依赖进口发展中国家的矿产。矿产供应存在的真正问题不在于基本储量的充裕程度, 而在于如何获得矿产, 如何制定勘探和开发的条件, 如何在生产者、消费者和矿产所在国政府之间进行利益分配等政治经济问题。”如果有必要的话, 应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强制性的人口控制计划, 以确保美国获取这些战略资源。这一文件最

收稿日期: 2009-05-13

作者简介: 赵丽红, 女, 经济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北京 100007)

¹ 这 6 家美国跨国农业综合公司分别是: 嘉吉谷物公司、大陆谷物公司、库克工业公司、达孚公司、邦基公司和 ADM 公司。

² 亨利·基辛格是依靠洛克菲勒家族起家的。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 基辛格从哈佛大学毕业受聘于洛克菲勒基金会。

后总结道：“从长远来看，最不发达国家必须降低人口增长速度，大规模地增加农业生产。”¹可见，《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 200 号》将粮食与人口及战略性矿产资源联系起来，认为不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是美国战略利益的威胁，其主旨是要实施“世界人口行动计划”，大幅降低世界人口数量。

《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 200 号》为基辛格早期的“粮食武器”披上了新衣：“在人口战略中粮食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我们必须为应对粮食严重短缺而储备充足的粮食，最不发达国家的粮食生产必须加以改造以满足人口和收入增长所导致的日益增加的需求。必须最大限度地保持人口的稳定，重点应该放在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因人口增长与发展潜力之间的不均衡，最有可能发生动荡和紧张局势。这些国家包括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巴西、菲律宾、泰国、埃及、土耳其、埃塞俄比亚和哥伦比亚。美国国际开发署人口计划项目应对这些国家实施计划生育给予技术和资金援助。”²这 13 个发展中国家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资源，《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 200 号》实际上认为，只有大幅减少这些国家的人口，美国才能充分利用它们的资源。

（二）尼克松的农业出口战略

农业出口战略和建立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粮食和农产品市场是尼克松政府“新经济政策”的核心。自由贸易是尼克松执政时期的政治口号。美国利用关贸总协定（GATT）这一贸易机制来推进其全球商业化农业的出口计划。通过贸易谈判给其他国家施压，消除美国农产品进口的农业贸易壁垒，从而扩大美国的粮食出口。美国认为，只有美国农业具有规模和效率、技术和资本优势，而欧共体这样保护农民利益的地区和国家都是在保护“低效率”。欧洲、日本及其他工业化国家都应放弃本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为美国成为世界粮仓开辟道路，这才是世界资源“最合理的”使用。第三世界国家应放弃在小麦、大米和其他粮食、牛肉等方面的自给自足，集中精力生产水果、蔗糖和蔬菜。第三世界国家应进口更多的“高效率”的美国粮食，它们可以通过出口蔬菜和水果来支付所需的费用。

（三）转基因农业计划

20 世纪 80 年代，在世界农业生产领域，美国发动了推广转基因粮食作物的“基因革命”。从里根执政时起，至少四位美国总统在其任内都不遗余力地支持转基因农业。实际上，这是以孟山都公司

为代表的美国农业综合企业等权势集团的利益需求。它们利用“旋转门”制度与政府结成了紧密联系。政府与这些权势集团一唱一和，以私人企业利益替代公众利益，将鼓励转基因农作物放在优先的战略地位。”

生物技术和植物及其他生命形式的基因改造最早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美国研究实验室中产生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创立了分子生物学及其基因研究，投入了数亿美元促进基因工程在粮食方面的应用。1986 年，美国政府开始对发展中的生物技术行业撤销管制和监督。1992 年，在一项总统行政命令中，布什总统裁定所有的转基因植物和食品与同品种的传统植物“实质上相同”。这一说法意味着转基因农作物不仅可逃避生化和毒性检测，而且还可以名正言顺地为这些“新创造的植物品种”申请“独占性专利保护”。对于这一裁定，此后历届美国政府都表示支持，美国政府一直将转基因食品看作“天然食品的补充”，认为没有必要进行特殊检测。克林顿政府还斥资数十亿美元推广转基因作物，将其作为引领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技术。

1984 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启动了绘制水稻基因图谱的研究，随后开发了一种被称为金水稻的品种，宣称这种水稻可以提供维生素 A。洛克菲勒基金会通过由其控制的组织向发展中国家大力推广农业生物技术。这一组织开列了一份重点引进基因工程植物和农作物的国家名单，包括 12 个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肯尼亚、埃及、津巴布韦、阿根廷、巴西、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这份名单与 17 年前基辛格的名单大部分重合。这说明，美国的地缘政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保持不变。1999 年，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宣称：“如果我们每天能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多一点富含维生素 A 的转基因金水稻，那么每天就能拯救 4 000 个因营养不良而生命垂危的人。”³而研究表

¹ Henry Kissinger “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200: Implications of Worldwide Population Growth for US Security and Overseas Interests”, Apr. 24, 1974, <http://www.populationsecurity.org>

² [美] 威廉·恩道尔著，赵刚等译：《粮食危机》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年。

³ 华盛顿因此被称作“旋转门政府”（revolving-door government），即大公司直接雇用政府官员担任高管，从而利用政府的影响力和人脉关系获利。同样，反方向的旋转也行得通，大公司的高管被安插到政府部门任要职，从而推行公司的计划。

⁴ [美] 威廉·恩道尔著，赵刚等译：《粮食危机》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年，第 138 页。

明, 一个人平均每天需要吃掉 9 000 克大米才能满足人正常的维生素 A 的最低摄入量。洛克菲勒基金会声称利用转基因生物可以养活世界, 这个神话掌握在强大的神话制造者手中。转基因革命至今仍在世界范围内继续。

为了使转基因农作物成为世界农业市场居主导地位的基本作物, 就必须建立一个凌驾于各国政府之上的新执法机构。这个新机构就是 1995 年在日内瓦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 (WTO)。事实上, 从 1948 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 (GATT) 成立以来, 美国一直坚决抵制把农业纳入世界贸易谈判之中, 担心其中的国际规则将为外国粮食进口打开美国的市场, 从而损害美国农业的竞争力。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美国的农业出口一直是国家战略的重点。但是, 在 1986 年关贸总协定有关贸易自由化乌拉圭回合谈判中, 美国却将农业贸易作为重中之重。原因很简单, 由于美国政府的大力扶持, 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美国的农业综合企业的力量已经很强大, 足以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全球性贸易攻势。美国在乌拉圭回合农业议题上的立场被称为“阿姆斯特图茨方案”: 禁止所有政府的农业项目和价格补贴; 禁止各国为了保护本国农业生产而寻求实行进口控制; 禁止政府对农业的所有出口控制, 即便是在饥荒时期。¹ WTO 成了美国实现世界粮食霸权的新武器, 它可以通过各种国际规则强行打开国家间的各种壁垒, 从而加速商业化的转基因作物的扩散, 最终实现控制世界粮食生产和贸易的目的。以美国农业综合企业为首, 以“阿姆斯特图茨方案”为基础, 起草了“WTO 农业协定”, 其政策目标是创造一个自由的、一体化的全球农产品市场。其实质是瓦解各国法律, 保护农业综合企业巨头的强大定价权。“WTO 农业协定”加上 TRIPS (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 规则, 使孟山都、杜邦等美国农业综合企业成为世界主要粮食作物的专利转基因种子的控制者。1992 年布什总统对有关转基因作物与普通作物“实质上相同”的裁定, 也被列入“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之中。一旦有国家禁止转基因生物进入人类食物链, 按照 WTO 的“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 将被视为“不公平贸易做法”; 如果有国家要求标明转基因食品, 按照 WTO 的“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 则被视为设置“贸易的技术壁垒”。由于大部分转基因生物尚处于试验阶段, 当时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曾提出有必要制定一份应对转基因生物潜在

风险的议定书, 却遭到了美国的强烈反对。美国认为, 由于对转基因生物风险和安全性的担忧并“未得到证明”,² 因此, 应将要求签订《生物安全议定书》视为“设置贸易壁垒”, 禁止不公平贸易的 WTO 规则必须优先于《生物安全议定书》。从此, 美国为转基因种子在全世界不受限制地扩散扫清了道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孟山都、先正达、杜邦等转基因植物专利持有者声称, 转基因作物将解决世界饥饿和粮食安全问题。但事实上, 它们导致研究受到限制、遗传植物多样性减少, 增加了单一作物的种植方式将导致植物物种总体上遭到毁灭的风险, 以及作为全人类共同遗产的种子的所有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四) 生物燃料计划

进入 21 世纪, 粮食卡特尔打着环境保护的幌子, 鼓动欧美政府发起了“生物燃料革命”。在对农作物大规模地转换为汽车燃料实行补贴的政策激励下, 德国、奥地利、法国和美国, 到处可见田间成片成片的玉米和其他作物长势喜人, 但这些粮食不是用来吃的, 而是作为生物燃料用来烧的。

2006 年美国通过了一项新法案, 以补贴用作燃料的玉米的种植, 这股改种风潮席卷美国。数以百万公顷的粮田被改作他用, 这正是当前世界粮食恐慌的祸根。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 近期粮食价格的上涨至少有 75% 的原因直接与生物燃料有关, 这不仅仅是一场粮食危机, 更是一场政治危机 (这份报告由于受到美国的干预而未能公开发布)。在这场粮价飙升的危机中, 孟山都、先正达、杜邦先锋良种、陶氏益农、巴斯夫等专利种子公司宣称, 转基因生物是解决世界粮食危机的唯一途径, 转基因生物种子 (GMO) 能持续提高全球粮食产量。由于转基因作物还未经过长期可控的研究和测试, 许多欧洲国家起初一直对种植转基因作物心存疑虑, 但是, 一旦将这些作物用作燃料而非食用, 这些国家就毫无顾忌地开始种植转基因玉米及其他作物了。但是, 德国农业部最近宣布, 禁止种植美国孟山都公司研发的 MON 810 型转基因玉米, 因为研究表明, 这种玉米对蛀虫蛾子具有抵抗性, 将会

¹ 1986 年丹尼尔·阿姆斯特图茨任里根政府派驻关贸总协定的大使。在此之前, 他曾任嘉吉公司高管。

² 有关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的许多研究表明, 转基因生物存在不安全性和巨大的风险。Geoffrey Bean, *Unborn Babies Could be Hamed by GMOs*, *The Independent*, 8 January 2006

对生态环境构成危害。德国是继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等国第六个禁止种植转基因玉米的欧洲国家。¹

总之，美国权势集团就是这样从“取消世界粮食储备制度”“农业商业化”“绿色革命”到“基因革命”和“生物燃料革命”，不断使用新技术以逐步控制世界粮食生产和贸易。20世纪70年代，基辛格曾展望美国地缘政治的长期目标是：“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人。”2007~2008年爆发的粮食危机已表明，美国正在接近这一目标。

二 美国全球粮食战略中的拉美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拉丁美洲防御理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政府任命纳尔逊·洛克菲勒为美洲事务协调员。纳尔逊提出了“美国—拉丁美洲防御理念”，即拉拢拉美地区的军事精英，把他们的利益与美国的政策牢牢地拴在一起，在这些军事独裁者的协助下，使美国资本在拉美国家的石油业、工业、金融业、农业等战略部门占据主导地位。纳尔逊把这些与美国合作的军事独裁者称为“新式军人”（the New Military）。从20世纪30年代起，纳尔逊一直是在拉丁美洲投资的美国企业的领军人物，他当时任标准石油公司委内瑞拉分公司——克里奥尔石油公司的董事。20世纪40年代，纳尔逊还创建了墨西哥—美国开发公司，专门投资于墨西哥工业。他的兄弟戴维·洛克菲勒在墨西哥创建了大通银行拉丁美洲分行。除投资拉美的石油、工业和金融业以外，洛克菲勒家族还在拉丁美洲大量购买肥沃的廉价农田，如在哥伦比亚的马格达拉纳河附近购买了60.7万公顷的肥沃农田；在委内瑞拉购买了大型牧场，等等。洛克菲勒家族在拉丁美洲的投资从石油扩展到农业领域。²1947年，纳尔逊建立了国际基本经济公司，专门投资于农业领域。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该公司与嘉吉公司联合在巴西开展杂交玉米种植、大豆生产、生猪生产、利用直升机喷洒农药、承包耕种、粮食存储以及动植物遗传学研究等业务。”这两家美国粮食贸易公司在巴西推广大豆生产取得了成功，使大豆成为美国的主要出口产品，也成为美国粮食控制的一件主要武器。

（二）在巴西和波多黎各实施人口控制计划

“对不发达国家人口的控制是仅次于核武器控

制的头等大事。”洛克菲勒基金人口理事会和美国卫生、教育和社会福利部在波多黎各发起了绝育运动。它们宣称，绝育能保护妇女的身体健康，少生孩子也有利于稳定家庭收入。它们鼓励贫困的波多黎各妇女到由美国新建的医院去生孩子，医生们奉命给生过2个孩子的妇女实施绝育手术，然而这些妇女对此却并不知情。据波多黎各公共卫生部的调查，截至1965年，约35%的育龄妇女做了永久性绝育手术。波多黎各的妇女绝育率居世界第一位。³

巴西是实施《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计划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基辛格在《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计划中强调了巴西的特殊地位，因为“它在人口方面明显主导着南美大陆，巴西人口快速增长意味着在今后25年内，巴西在拉丁美洲和世界舞台上的势力和地位将日益上升”。巴西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实施《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计划，到1991年，巴西卫生部对全国妇女的绝育问题进行了调查，发现在实施人口控制计划后，约占人口总数一半的非洲裔人口中，多达90%的非洲裔妇女接受了绝育手术；在14~55岁的巴西妇女中，约有44%的妇女已永久性绝育。这些绝育手术均由国际计划生育联盟、美国开拓者基金会、自愿外科避孕手术联合会和国际家庭健康组织等国际机构实施的，而这都是在美国国务院下属的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支持和指导下去进行的。⁴

（三）墨西哥的“绿色革命”

为把美国的商业化农业引入主要发展中国家，洛克菲勒家族还提出了“绿色革命”的理念，其实质是以传输先进农业科学技术的方式来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

绿色革命发源于墨西哥，20世纪五六十年代风行于拉丁美洲。1966年，墨西哥政府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共同成立了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致力于推行20世纪40年代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的小

¹ 《转基因玉米在德遭禁》载《环球时报》2009年4月16日。

² [美]威廉·恩道尔著，赵刚等译：《粮食危机》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第90页。

³ John Freivalds “Brazil Agriculture Winning the Great Farms Race”, 2005, <http://www.brazilnax.com>

⁴ J. L. Vasquez Cazada “Puerto Rico: A Case Study of Population Control”,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ol 4 No 4, Fall 1977.

⁵ Andre Caetano “Fertility Transition and the Transition of Female Sterilization in Northeastern Brazil: The Roles of Medicine and Politics”, <http://www. iussp.org>

麦育种研究计划。¹

虽然新型杂交玉米和小麦的产量比传统玉米和小麦的产量提高了 2~3 倍,但单一栽培的新型杂交种子品种降低了土壤肥力,致使农作物逐年减产。²且杂交种子本身具有繁育能力差的特点,其下一代产量要比上一代的产量减少很多,这意味着农民每年都要通过购买新种子才能获得高产。然而,恰恰是二代种子低产的特点才消除了农民私存种子以及种子生产商和中间商出售和分销种子的可能性,保证了杂交母本种子的专利集中于以杜邦公司的先锋良种和孟山都等少数大型公司手中。绿色革命和杂交种子为美国的商业化农业控制新兴经济体的主要市场提供了保证。

种植新型杂交小麦需要化肥、拖拉机及其他农业设备,尤其需要灌溉技术。然而只有大农场主才有能力购买这些设备。因此,大农场主才是新技术的主要受益者,而小种植户不仅不能受益,甚至还受到损害。由于绿色革命提高了农业投入成本,实行了机械化作业,加上许多大农场主采取增加租金的方法迫使承租人离开土地,因此,农村的就业机会减少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下降了,加剧了富有的大庄园主和贫困的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绿色革命实质上也是一场化学革命,大量使用化学药剂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由于大量使用除草剂和杀虫剂,对当地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这却为石油和化学巨头提供了利润颇丰的额外市场。所谓超级小麦实际上是依赖使用大量化肥而提高产量的。普通农民负担不起化肥、杀虫剂及其他投入的支出,只能依靠贷款或私人借贷。许多农民并未从最初的高产中获利,因为他们必须卖掉大部分农产品来偿还借款和利息,最后不得不卖掉土地。

此外,90年代初的研究发现,绿色革命推广的高产作物品种中矿物质和维生素含量很低,长期食用会产生营养不良。这说明绿色革命并不能真正解决饥饿问题。

(四) 阿根廷的“第二次绿色革命”

20世纪80年代末,转基因项目正式启动,这一项目的实施地在阿根廷,这是因为洛克菲勒家族与阿根廷时任总统卡洛斯·梅内姆之间关系密切。20世纪90年代,基因革命像飓风一样席卷世界农业,将转基因引入农业被称作“第二次绿色革命”。然而,“第二次绿色革命”——转基因农业使阿根廷的农业基本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一度富饶多产的以家庭式农场为基础的农业体系被改造成

了一种由少数势力强大、富有的大庄园主主宰的新封建主义状态,这个国家在“技术进步”的名义下完全失去了粮食自给能力,整个国家的农业经济完全受制于美国的权势集团。

20世纪80年代以前,阿根廷是拉丁美洲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当时阿根廷的农业生产体系是多样化的、富饶多产的,以小型家庭农场为主导,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几十年保持不变。直至80年代,阿根廷农业不仅能实现农产品的自给自足,还能产生大量剩余,政府无须对农业提供补贴。1996年,梅内姆总统向孟山都公司颁发许可证,允许它在阿根廷全国独家销售转基因大豆种子和与之配套使用的农达除草剂。”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这个国家的农业经济被彻底改造了。20世纪70年代,大豆在阿根廷的农业经济中所占地位微不足道,种植面积只有9500公顷;而在2000年,转基因大豆的播种面积超过1000万公顷。大土地所有者仍不断大量砍伐森林,以便为大豆种植提供更多的土地。阿根廷潘帕斯草原上自由自在的牛群被迫圈进了美国式的大型牛栏,以便为利润更丰厚的大豆让路。传统的谷物、小扁豆、豌豆和绿豆田几乎消失殆尽。1988~2003年,阿根廷的奶牛农场减少了一半,不得不以比国内高得多的价格从乌拉圭进口牛奶。³到2004年,阿根廷全国农业用地的48%被用于种植大豆,其中90%~97%种植的是孟山都的转基因抗农达大豆。在改种孟山都大豆仅仅4年之后,阿根廷农业的多样性被迅速改变成种植单一农作物。对转基因大豆的影响有深入研究的阿根廷著名农业生态学家沃尔特·蓬科预言:“如果我们继续走这条道路,这片土地恐怕在50年内不会再出产任何东西了”,⁴就像19世纪80年代因单一种植棉花而被摧毁的埃及农作方式一样。

机械化的单一种植大豆的农作方式以及大量良

¹ <http://www.cgiar.org>

² Harry C. Leaver “The Contradictions of the Green Revolution”, <http://www.eco.utexas.edu>

³ 孟山都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转基因专利大豆——抗农达大豆的种子生产商。这种转基因植物能经受住非选择性除草剂草甘膦的喷洒。草甘膦是农达除草剂中的活跃成分,能杀死传统的大豆。而农达就是美国政府用来清除哥伦比亚毒品作物的那种除草剂。而抗农达大豆能免受农达除草剂的伤害。

⁴ Lillian Joensen and Stella Seniq, *Argentina's Torrid Love Affair with the Soybean*, Seedling, October 2004.

⁵ Sue Branford *Argentina's Bitter Harvest*, New Scientist, 17 April 2004.

田被外国投资者收购，迫使数十万农民离开土地，贫困和营养不良现象大量出现。据阿根廷官方统计，1970年的贫困率仅为5%，1998年这个数字陡升至30%，2002年激增至51%；以前在阿根廷闻所未闻的营养不良现象，至2003年营养不良的人口约占3700万总人口的11%~17%。¹

转基因种子提供的转基因种子是具有“基因使用限制技术”的专利种子。该公司研制了“终结者”技术，将玉米、大豆、棉花籽等传统种子经过基因改造，使之在收获后就“自杀”。这种技术能自动防止农民为来年耕种而保留或重复使用种子，使用该项技术的农民只有每年向种子公司购买新种子才能维持生产，打破了人类社会传统的“播种—收获—再播种—再收获”的循环粮食生产方式，使农民陷入对专利种子严重依赖的恶性循环。另一种“背叛者”技术则是要求使用者必须同时使用特定的化学物才能保证农作物抵御病虫害。这些跨国转基因种子就是通过基因使用限制技术来确保自身的垄断利益。但是，阿根廷的国家《种子法》并不保护孟山都的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种子专利，当阿根廷农场主在下一季再次使用其种子时，从法律上说孟山都不能要求他们支付专利费。农民出于自己使用的目的再次播种这些种子，不仅符合传统，而且也是合法的。然而，收取这种专利费或“技术许可费”，是孟山都这些种子公司市场营销方案的核心。为了在阿根廷扩展大豆革命，最初孟山都故意放弃收取“技术使用许可费”，以尽可能加速其转基因种子在这片土地上的扩散，特别是尽可能扩大与这些种子配套的、拥有专利的草甘膦农达除草剂的使用。而在引进转基因大豆3年后，1999年孟山都公司正式向农民提出了为种子支付“延期专利费”的要求，尽管这一要求并不符合阿根廷法律的规定，但梅内姆政府并未提出任何抗议。孟山都公司则将自己装扮成农民滥用和“盗窃”行为的受害者，不断对阿根廷政府施压：如果阿根廷拒绝承认“技术许可费”，孟山都将在进口大豆的地点（如美国和欧盟）强制收取专利费，因为在美国和欧盟，孟山都的专利都是得到承认的。这一措施意味着，阿根廷商业化农业的出口市场将受到毁灭性打击。孟山都公司还威胁说，将阻止阿根廷销售所有的转基因大豆，声称在“黑市”上销售的85%以上的大豆都是由农民非法再次种植的。阿根廷农业部长米盖尔·坎波斯后来宣布，政府与孟山都公司达成了协议。阿根廷

农业部成立一个“技术补偿基金”，从2004年年底起，在粮食加工环节上向农民收取相当于大豆销售额1%的专利使用费，抗农达转基因大豆的技术使用费平均每英亩6美元，这笔收费再由政府返还给孟山都公司和其他转基因种子供应商。²

以大豆为主的单一作物农作方式，使阿根廷人在2002年发生的全国性经济萧条中表现得十分脆弱。以前在困难时期，农民、甚至普通城市居民可以自己种植作物以求得生存。而在阿根廷农业转型为工业化的商业化农业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由于经济形势恶化，担心粮食危机引发骚乱，在孟山都和嘉吉等公司的帮助下，阿根廷政府向饥饿的人群免费提供用大豆制成的食品。一场全国性的推广运动开始了，政府鼓励人们用大豆来替代新鲜蔬菜、肉、奶、蛋等健康食物。杜邦农业科学公司建立了一个组织——“生命蛋白”作为这场推广运动的一部分，向数千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穷人分发大豆强化食品。政府和私营公司大肆鼓吹大豆食物对健康有巨大的好处，可以代替牛奶或肉类蛋白。但科学研究却表明，以大豆为基础的食物不适合人类长期食用。研究表明，与用母乳或牛奶喂养的婴儿相比，用豆奶喂养的婴儿的过敏症发生几率会大大提高。大豆含有一种抑制剂——胰蛋白酶，如果大豆作为人们食物中的主要成分，这些物质会损害健康并可能导致胃癌。

此外，事实证明，抗农达大豆作物的产量要比传统大豆作物平均低5%~15%。农民还发现，新长出来的杂草需要使用比以前多两倍的喷洒量才能清除掉，化学药剂使用量的增加加大了成本。美国农业部1997年以来的统计数字表明，随着抗农达大豆种植面积的扩大，草甘膦的使用量增加了72%。³在阿根廷2003年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使用飞机大量喷洒化学药剂对传统作物、人类健康和自然环境都产生了危害：不仅杀死了农民种植的传统作物和蔬菜，连家畜也死掉了；有人因除草剂出现严重恶心、腹泻、呕吐、皮肤损伤等症状；转基因大豆种植田附近产下的动物出现严重的器官畸形，香蕉和甘薯也变得奇形怪状，湖里突然漂满死鱼；对珍贵的林地的破坏更大。

¹ Lillian Joensen and Stella Sen inq, *Argentina's Torrid Love Affair with the Soybean*, Seedling, October 2004.

² GRAIN, "Monsanto's Royalty Grab in Argentina", <http://www.grain.org>

³ <http://www.isuz.org>

但在阿根廷农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为时已晚。至 2004 年,转基因大豆已在阿根廷全国扩散开来,使用的种子都需要依靠孟山都的农达农药。这种束缚农民的手段实在太高明了!然而,并非只在阿根廷推行转基因农作物计划。2005 年年初,巴西议会通过法律,首次使种植转基因种子在巴西合法化。理由是,转基因种子的使用已扩散得如此广泛,以至于已无法控制其蔓延。到 2006 年,阿根廷、巴西和美国占据了世界大豆产量的 81% 以上。这意味着,世界上豆粉喂养的所有动物实际上都在食用转基因大豆。¹

(五) 秘鲁受到基因使用限制技术的威胁

在 2006 年 1 月召开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工作组第 4 次会议上,来自秘鲁的农民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禁止终结者技术的国际化:“我们依赖于从收成中获得的种子作为下一个耕作期使用的种子的方式,这个留种传统支撑了安第斯山脉和亚马孙流域的生物多样性和生计方式。安第斯山脉和亚马孙流域的生物多样性正在受到来自终结者作物流入的威胁。终结者作物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本地农民传统上作为重要药材和食品来源的野生物种。生物多样性是世界粮食安全、各国主权的基础。秘鲁作为世界 12 个生物多样性的国家之一,一旦将终结者技术推广到秘鲁农业体系中,会使本地农民被迫放弃他们作为生物多样性管理员的传统角色,这样做也会威胁现在及未来的全球粮食安全。作为马铃薯原产地,秘鲁有超过 2 000 个品种的马铃薯。鉴于马铃薯的终结者品种已获得专利(先正达,美国专利号 6700039, 2004 年 3 月),将基因使用限制技术推广到秘鲁,将会给马铃薯原产地中心带来无法弥补的巨大风险。”²

三 美国全球粮食战略中的中国

自 1996 年以来,全世界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每年呈 2 位数增长,2004 年达 6 760 万公顷,约占世界农业耕地总面积的 25%。其中,转基因大豆占世界大豆产量的 56%,转基因玉米占世界玉米产量的 14%,转基因棉花占世界棉花产量的 28%,转基因芥花籽占世界油菜籽产量的 19%。全世界有 17 个国家的 800 万农民种植转基因作物,其中 90% 的农民在发展中国家。”2005 年,中国也制定了实施转基因作物的计划。跨国粮商正在将当初通过控制南美洲的物流来实现控制南美洲大豆

的这种模式复制到中国东北粮食主产区。

由于中国土地所有制及其相关政策的原因,国际资本首先瞄准了粮食加工领域,进军中国大豆压榨业。2000 年以前,中国的大豆压榨业中,内资企业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2003 年,外资大豆压榨产量仅占全国产量的 18%。然而,从 2004 年起,跨国巨头利用期货把大豆价格一路拉到了每吨 4 300 元,在高价的引诱下,国内榨油企业集中采购了约 300 万吨美国大豆。随后,跨国巨头又将价格打压至每吨 3 100 元,致使中国油脂企业半数破产,跨国粮商便趁机利用并购、参股、合资等形式,控制了近 60% 的国内油脂企业和中国 85% 的油脂加工总量,操控了国内食用油市场价格,2007 年以来,国内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其中食用油涨幅最大。³

跨国巨头还想方设法挤占中国国内油脂企业在消费市场上的份额。他们在东北大量收购非转基因大豆,把高价生产的非转基因大豆油,以远远低于转基因大豆油的价格推向市场。商家刻意在转基因大豆油旁放一瓶非转基因大豆油,并标明转基因大豆油油价明显高于非转基因大豆油,误导消费者价格越高的油品质越好。这样做,一方面有利于培育转基因大豆油的消费市场,另一方面故意压低非转基因大豆油的市场价格,使国内油脂生产企业处于投入成本高、销售价格低的竞争劣势,从而挤压东北本地油脂企业在市场上的份额。目前,国储大豆价格为每吨 3 700 元,而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到港价平均在 2 900~3 200 元之间,差价在 500~800 元之间,即便扣除 200 元运费后,差价也在 300~600 元之间。根据黑龙江省大豆协会的资料,2009 年,黑龙江 68 家油脂企业几乎全部停产。

(下转第 26 页)

¹ [美] 威廉·恩道尔著,赵刚等译:《粮食危机》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第 149 页。

² “Potential Socio-economic Impacts of Genetic Use Restriction Technologies (GURTs) on Indigenous and Local Communities”, UNDP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Fourth meeting, Granada, 23-27 Jan. 2006, <http://www.biodiv.org>

³ Clive James “Global Status of Commercialized Biotech/GM Crops 2004”, ISAAA, No. 32, 2004.

⁴ 央视“经济半小时”:《外资企业侵蚀我国粮食安全调查》, <http://www.sina.com>; 李春艳:《外资侵蚀中国粮油市场,中国粮食安全堪忧》,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年1月22日。

的流入，但是，当本国市场存在较发达的金融衍生市场的情况下，将会因投机性资本通过大量的规避管制渠道，从而降低管制的效率，增加管制成本。

主要参考文献

1. Jos Antonio Ocampo and Camilo Ernesto Tovar, *Price-Based Capital Account Regulations: the Colombian Experience*, Development Finance Unit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Development Finance Division Santiago, Chile, Oct 1999.
2. Jos Antonio Ocampo and Camilo Ernesto Tovar,

“Colombia's Experience with Reserve Requirements on Capital Inflows”, CEPAL Review, No. 81, Dec. 2003.

3. Guillermo LeFort-V. and Carlos Budnevič L., *Capital Account Regulations and Macroeconomic Policy: Two Latin American Experiences*, Central Bank of Chile, 1998.

4. Jos Daro Uribe, “Capital Controls and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Intervention in Colombia”, BIS Papers, No. 23 2003.

(责任编辑 蔡同昌)

(上接第 20 页)

在黑龙江豆油销售市场上，2008 年国产非转基因豆油的份额还能占到八成，而到 2009 年只占到两成，市场已经被转基因豆油所垄断。¹

大豆加工企业的大量倒闭，首先受损的是上游的豆农们。东北豆农卖豆难的问题非常严重，具价格优势的进口大豆大量涌入国内市场，国产大豆即使低价，大多仍卖不出去。据海关统计，2008 年中国共进口粮食（含谷物及大豆）390 亿公斤，其中约 375 亿公斤是大豆。2009 年 3 月进口大豆 386 万吨，同比增长 66.6%。据黑龙江省大豆协会统计，自 2008 年 11 月以来，进入黑龙江省的转基因大豆有 26 万吨。进口转基因大豆侵入中国非转基因大豆主产区，不仅严重损害了东北大豆产区 4 000 多万豆农的利益，而且有可能使东北大豆灭种。

目前，已控制中国大豆油半壁江山的新加坡丰益国际公司，其旗下控制的大豆压榨企业已达 12 家，年压榨能力超过 1 000 万吨，占据了国内小包装食用油近 85% 的市场份额。这家公司还准备投资黄淮地区，以扩大玉米和小麦的加工。2005 年，获得中国政府有关在中国国内进行玉米国内贸易许可证的路易达孚公司，正在经营将华北和东北玉米销往南方和西南地区的业务。一旦外资控制了国内农业产业链的上下游，中国的粮食就将受制于人，中国的粮食安全就会出现严重问题。只要跨国公司操控了粮食价格，中国政府就无法调控国内粮食市场，如果采取行政干预，跨国公司便会使用 WTO 条款进行应对。

随着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中国粮食加工和流通领域，东北粮食主产区的加工企业大量停产和倒闭，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警惕。在国家政策层面

上也趋于对外资收紧，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商务部 2007 年 12 月公布了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明确规定今后在大豆、油菜籽食用油脂加工领域，只允许中方控股。”而且，今后外资如果投资中国粮油市场、粮油加工贸易，必须经过政府部门对外资的规模以及对粮源控制等方面进行评估后方可决定能否进入。但笔者认为，光出台这样的应对政策恐怕还是不够的，政府还须构建一个全面系统的粮食安全保障战略才能真正确保中国的粮食安全。

主要参考文献

1. Henry Kissinger, “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200 Implications of Worldwide Population Growth for US Security and Overseas Interests”, Apr 24 1974.
2. J. L. Vasquez Cazada, “Puerto Rico: A Case Study of Population Control”,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ol 4 No. 4, Fall 1977.
3. Sue Branford, *Argentina's Bitter Harvest*, *New Scientist*, 17 April 2004.
4. Lillian Joensen and Stella Semino, *Argentina's Torrid Love Affair with the Soybean*, Seedling, October 2004.
5. “Potential Socio-economic Impacts of Genetic Use Restriction Technologies (Gurts) on Indigenous and Local Communities”, UNDP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Fourth meeting, Granada, 23-27 Jan. 2006.
6. [美] 威廉·恩道尔著，赵刚等译：《粮食危机》，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年。

(责任编辑 蔡同昌)

¹。央视“经济半小时”：《外资企业侵蚀我国粮食安全调查》，<http://www.sina.com>

》《关注外资粮油企业受限》<http://cnyouzhi.com>

Abstracts

Reflections on China's Strategy in Latin America (pp. 3–8)

Latin America is a region of strategic significance for China, which is a key partner for China to attain future development goals and realize the political reunification. Economically it is a major investment destination and a market with huge potential and China seeks to assure an access to some important resources in the region.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a to note the following points when formulating the strategy in Latin America: to boost and enrich Sino–Latin American high–level cooperation; to broaden ties with the regional multilateral organizations; to strengthen strategic cooperation with the regional powers; to accelerate the ongoing FTA negotiations and make efforts to reach more FTA with the regional countries; to draw up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for investment and trade in the region, aimed at facilita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oing global” strategy; to deepen financial cooperation with the region; to enhance the coordination with other developing powers in the field of Latin American affair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domestic policies for Latin America by establishing a nation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and to handle with a new thinking the U.S. factors in Sino–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Shen An)

Effects of the OECD Membership on Mexico (pp. 9–13)

Mexico was formally admitted by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in May 1994. According to the Mexican authorities, the OECD membership is able to benefit the country by enhancing her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allowing the full access to the OECD data, boosting her dialogues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promoting the orientation toward sticking to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in the course of policymaking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standard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serving as the linkage between emerging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participating in the form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standards.

Greatly different from the accession to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 the accession to the OECD didn't incur strong opposition in Mexico. The suggestions put forward by the OECD are not compulsive and thus tend to be accepted by Mexico. Thanks to the OECD's directions, a series of public policies were brought in to effect, including the formulation of laws on competition and ecological bala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ederal Competition Commission, the modification of agricultural subsidy polici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ublic education.

(Lu Guozheng)

U.S. Global Food Strategy: Latin America and China (pp. 14–20)

A resource with strategic significance, the food is closely related to a country's ability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eeking to dominate the world food production and trade, the U.S. power blocs continuously advocate the employment of new techniques, which once put forward to abrogate a global system of food reserves, initiated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called for a Green Revolution, and later turned to preaching the Gene and bio-fuel revolutions. Due to the interaction of agriculture commercialization and food politicization, many countries have witnessed a continuously growing import of the U.S. agricultural techniques, genetically modified seeds and fertilizer, which plunge their agriculture into a heavy dependence on the United States. Resulted from

the encroaching of transnational capital in China's food market since 2005. China's food security has been under a threat (Zhao Lihong)

Capital Account Opening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Capital Controls in Colombia

(pp. 21–26)

Capital account opening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olombia's Economic Stabilization Plan in early 1990s, which is divided into two phases. The first stage is mainly the liberaliz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second one to deregulate the controls on short-term capital and foreign loan. In the early 1990s, as a result of a large inflow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 the Colombian economy was facing multiple challenges including real exchange rate appreciation, high external vulnerability of financial system and inflation pressures. To meet those challenges, the Colombian monetary authorities followed the Chilean way to take a series of capital control measures from 1993 to 1998 such as the Unremunerated Reserve Requirement and the Tobin tax. These measures succeeded to a certain extent in reducing capital inflows and prolonging the term of capital inflow, but greatly increased the financing cost of domestic enterprises (Huang Zhilong)

Pro-cyclical Fiscal Policy in Latin America: Gains and Lessons (pp. 27–30)

Most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usually followed pro-cyclical fiscal policy, which was a result of their economic and political vulnerabilities and especially related to a lower saving rate. When there occurred worsening of terms of trade and acute fluctuations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 and interest rate, the pro-cyclicality tended to weaken a country's ability to resist external shocks. It has been proved that fiscal policy followed by an opening economy is heavily restricted by terms of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 (Sun Hongbo, Wang Qian)

On the 21st Century Socialism in Venezuela

(pp. 31–35)

In Venezuela, the 21st century socialism serves as a guiding principle for the Chavez government to launch a radical reform of the national socio-economic mode. Basically it advocates democracy, namely keeping the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and the multiparty system, and people'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y developing a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Economically it seeks to establish a mixed economy with private and public ownerships, applauds for state intervention, and approves of promoting social justice and improving welfare. Internationally it calls for democrat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 construct the socialism, the Chavez government amended the constitution and formulated a series of new laws, nationalized large businesses in the key industries, implemented scores of social missions, and strived to boost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meantime it is confronted with major challenges like the excessive dependence on President Chavez's personal leadership, sharp divergences among the Venezuelan leftists, and the increasing hostility of the opposition parties (Wang Peng)

On Communitarian Socialism in Bolivia

(pp. 36–41)

One of the major socialist thoughts in Latin America, the communitarian socialism is regarded by Bolivia's Morales government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 for it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t emphasizes the need to achieve social justice, improve education and public health, and safeguard poor people's rights, advocates to base the nation's development on communities, labor unions and families, and calls for establishing participatory and communitarian democracies. Thanks to the government efforts,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was rather fruitful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fields.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to meet challenges from the opposition who are greatly conflicting with the Morales government (Fan Lei)